反向驯化理论视角下对微信技术的审视

王薪坤
（北京印刷学院 北京 102600）

【摘要】：本研究以“反向驯化”的理论视角对微信进行审视，提出微信发展带来的三大反向驯化特征，即自由交往带来的“自由陷阱”，社会比较滋生家居用户负面情绪，数字难民与数字仆人。并认为其“驯化”成因本质在于依靠技术逻辑支撑的技术力量不断发展，已忽视个体的价值理性，以此为个体对媒介的使用和媒介技术创造者以启发。

【关键词】：微信　反向驯化　启示

引言

本研究是建立在两大社会现实的基础之上，其一是理论现实，即由英国学者罗杰.西尔弗斯通提出的关于媒介技术与人的驯化理论，该理论的提出为审视媒介技术与个人主体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解读视角；其二是技术现实，不断更新的微信技术正在对个体的社交与生活产生持续性和渗入性影响。“反向驯化”理论是由英国学者罗杰·西尔弗斯通等人所提出的“驯化理论”衍生而来，该理论在强调人与技术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的同时，审视与反思媒介技术对人的“反向驯化”影响，为当前媒介技术在重塑人类社会形态时所扮演的角色和造成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解读视角[1]。当前，作为国内第一大社交软件，微信的发展已经重塑我们的社会生活，从社交到购物，从娱乐到办公，我们已离不开微信，微信已经成为了我们身体的“媒介”。无可否认，微信的发展使个体之间的联系更加方便快捷，其背后的媒介技术也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发展，但相伴随的是，微信让更多的人沉迷于虚拟社交，混淆“线下真我”和“线上自我”的边界和属性，也让微信技术之外的人沦为“数字难民”。在这场以微信为代表的媒介技术变革中，人既“驯化”了技术，让其依附于社会发展的轨道，同时技术也产生了对人的“反向驯化”。因而，本研究以社交软件微信为例，基于“反向驯化”的理论视角，重新审视微信自诞生之初到如今的发展过程，呈现其给大众社会生活带来的“驯化”特征，并从中窥探出微信对人所形成的“反向驯化”的原因，为大众重新思考微信作为我们日益依赖的社交软件在我们个体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应当扮演的角色提供了更加理性的角度和启示。

一、反向驯化的提出

“驯化”一词原为生物学领域中的词汇，意指动物经过人工训练之后形成的基于本能行为的条件反射，例如人与猫狗之间的行为关系。在新闻传播领域中，“驯化”最早源于“家居化”一词，家居化意指“传媒技术（如电视）经过消费过程，进入人们的私人空间——家居，成为家居这个日常生活场景的重要组成部分”，由英国学者罗杰·西尔弗斯通提出。在其后的研究中，“家居化”被赋予更加广泛地意义，追求除电视媒介之外的研究意义。因而，西尔弗斯通在其著作《电视与日常生活》指出“技术，在电视和电视节目这双重意义上而言，如果要在“家居”这个空间获得一席之地，就必须被‘驯化’”。之后，西尔弗斯通以“驯

chinaXiv:202303.00722v1

化”来表达社会大众在日常生活中“规训”传媒技术使用形态的能动过程[2]。在此过程中，“驯化”强调了人对物件的“使用痕迹”。在两者之间，个体既创建与发展媒介技术，同时也在媒介技术环境中受到潜在地持续性被动改变，意即媒介技术的‘反向驯化’[3]。在刘千才等人的论述中，“反向驯化”摈弃了技术悲观主义的立场，也脱离了技术还原论的窠臼，既将人的能动因素纳入考量，亦将技术意志作为影响因素。以微信为例，微信成为大众的“一种生活方式”既是个体能动性的作用，也是微信带来的媒介环境对大众社交方式的“捆绑”并逐渐演变的结果。另外，反向驯化尤其聚焦于个体与技术之间的互动关系，将研究观察的重点放在了人与技术之间的“规训痕迹”，通过“痕迹”来探讨技术对人的影响，这也在旧有的技术关系论基础上提供了一种崭新的且更加聚焦的视角。在此理论下，对具体的微信技术审视一方面更易将其影响规制在微信和用户之间的双向作用上，也更能窥探出微信发展背后的问题。

二、微信的技术发展

表 1 以社交功能为筛选条件罗列了微信迄今的发展更新过程。2011 年 1 月，微信以可发送照片的免费短信功能出现，并开始逐步替代短信的社交功能；同年 5 月，微信的 2.0 版本出现，在文字聊天的基础上增加了语音对话功能，降低使用门槛；之后，以空间地理为核心的“附近的人”“漂流瓶”社交功能上线，为陌生人交友提供了更加理想的平台，成为了微信自诞生以来再次收获大批用户的重要社交功能。2012 年，“朋友圈”功能出现，微信用户的生活展示与分享开始由线下转移到线上，用户黏性增强，slogan 改为“微信，是一种生活方式。”

chinaXiv:202303.00722v1

表 1 微信 1.0 至 8.0.14 的主要版本更新

<table>
<tr><th>版本</th><th>时间</th><th>功能发展</th><th>备注</th></tr>
<tr><td>1</td><td>2011.1</td><td>通过 QQ 导入联系人、即时通讯、分享照片</td><td rowspan="2">1.0 版本为“通知工具”——当你收到 QQ 离线消息、QQ 邮箱信件、微博私信时，它会在手机上通知你。</td></tr>
<tr><td>1.3</td><td>2011.4</td><td>支持多人会话(群会话)功能</td></tr>
<tr><td>2</td><td>2011.5</td><td>增加语音对讲功能</td><td rowspan="2">2.0 和 3.0 版本，微信开始向“移动社交”发展，不断增加社交属性，并逐步吸引全球用户。</td></tr>
<tr><td>2.5</td><td>2011.8</td><td>增加“查看附近的人”</td></tr>
<tr><td>4</td><td>2012.4</td><td>“朋友圈”上线；开放公众号 API 接口</td><td rowspan="3">微信 4.0 开始平台化，朋友圈、公众号、实时对讲、位置导航等功能加强微信的群属性功能，用户黏性增加。</td></tr>
<tr><td>4.2</td><td>2012.7</td><td>视频聊天；微信网页版上线</td></tr>
<tr><td>4.5</td><td>2013.2</td><td>多人语音实时聊天；位置导航</td></tr>
</table>

5	2013.8	扫一扫；微信支付；游戏中心上线	从 5.0 开始，微信开始注重用户的日常生活方面体验，为用户打造线上生活细节，线上线下无缝对接。
5.2	2014.1	微信红包；位置共享；理财通	
5.4	2014.8	购物和多项生活服务	
6.5.4	2017.1	小程序上线；分享照片前可编辑	6.5 版本小程序的上线，微信兼容各类 APP 功能运行，实现跨平台社交。
7	2018.12	拍“视频动态”记录眼前的世界	7.0 标志着视频博客(vlog)的到来，微信朋友圈从图文升级为短视频和直播等内容。
8.0.3	2021.4	朋友圈发送视频时长从 15 秒提升至 60 秒	

资料来源：https: //weixin.qq.com/

chinaXiv:202303.00722v1

2013 年，微信 5.0 版本增加了微信支付和扫一扫功能，开始进入大众的生活消费领域，用户群体与微信逐渐呈现不可分的连接状态，非用户群体开始出现脱离数字时代的状态，随后衍生出“微信红包”“抢红包”“红包接龙”等一系列娱乐消费功能。2016 年，小程序功能推出，实现操作平台式运营，并嵌入娱乐游戏、消费支付、快递服务、办公等生活功能；2018 年，平台引入 vlog 形式的短视频功能，用户可以通过拍摄短视频的方式记录生活，并通过点赞、分享评论实现社交互动。在表 1 所列出的技术更新序列中，一方面体现了微信以“社交”为主打功能的每一次技术强化，为用户提供了更快捷方便的使用体验，另外一方面在“驯化”审视下，也体现出了微信的每一次技术更新对用户所可能产生的潜在“反向驯化”。

微信从最初的消息通知工具到智媒体时代跨平台移动社交功能的实现，背后依靠的是智媒体时代的数字技术、媒体技术的发展与更新。在此过程中，社会主体创建与发展媒介技术，并将媒介技术作为生活工具完成生活形塑，而媒介技术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量在重构社会环境的同时影响着这种形塑，即技术与人之间的“驯化”和“反向驯化”。在此理论与技术背景中，本文探讨微信的更新发展于个体所形成的“反向驯化”现象。

三、微信的反向驯化特征

本研究对微信反向驯化特征的考察是以“反向驯化”为理论视角，以微信的社交属性为对象。从“反向驯化”的理论视角来看，微信的发展在给用户带来良好的社交体验和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为用户制造交往的“虚拟监狱”，在此视角中既不对技术发展持完全悲观的观点与立场，同时不丧失个体在技术面前的能动作用。另外，以下内容中的第三点是基于微信发展的宏观环境中而提出，其中既看到了技术发展带来的强大力量，也看到了这种力量在发展过程中带来的必然后果。

（一）自由交往带来“自由陷阱”

微信作为社交软件出现在大众生活当中，打破了以往大众传统社交方式，突破了时空的限制，创建虚拟社交平台，为用户自由获取信息和分享展示自我提供了理想平台，提供极大社交自由，但这种打破时空限制，将用户时间碎片化的方式在为用户提供技术自由的同时也将用户捆绑在碎片化的社交中,产生对微信社交的依赖。意即“这种看似打破时空阻隔，自

由交流不受外物控制的交流方式，却将人类深深困于其中并不自知。[4]”微信从最初的免费图片发送功能到如今的支持声、画、字和视频等全面社交功能，其技术不断深入用户线下生活场景，并为用户打造和复制出一个完全虚拟的线上社交平台，发展出用户更多的线上线下社交关系，并不断叠加，用户也置身于“各种圈层、各种性质关系的天罗地网中”[5]，难以脱身。

（二）社会比较滋生与加剧用户负面情绪。

杨逐原和郝春梅在其研究中认为社会比较的滋生与加剧深受现代社会和社交媒体的影响[6]，当前社会中个体的自我身份认同已从“传统的外在身份性自我认同”转变为“内在反思性自我认同”，个体通过内在反思建构的自我意识不仅仅是在个体内部发生的事情，还渗透着他者评价，是“自我宣称”与“他者评价”相一致的结果。微信的出现为用户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提供了技术条件，例如朋友圈的出现便成为了用户展示自我印象并获得他人点赞和评论的理想平台，在此平台中，用户之间的分享和评论营造了一种“分享即存在”的社交氛围，个体通过“朋友圈”进行“自我表演”，以此获得他人关注，并时刻通过他人对“自我表演”的反馈调整自己的“表演”。在此过程中，社交平台便成为了一种“圆形监狱”，每一个个体都同时成为了“监狱”中的“狱警”和“囚犯”，双方都通过各自“表演”处于时刻地互动和比较之中，这种互动和比较让个体时刻处于焦虑、孤独与压迫之中，并通过线上社交关系的不断强化和叠加而加剧。

（三）微信之下的“数字难民”与“数字仆人”

在目前的研究文献中，“数字难民”通常是指出生于数字时代前的老年人群体，他们由于年龄被排除在数字社会之外[7]。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 4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20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为 9.89 亿，60 岁及以上老年人是非网民的主要群体，占非网民总体的 46.0%，较全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高出 27.9%。腾讯的相关数据显示，在微信近 12 亿的用户量中，18 岁至 35 岁的年轻用户群体占比达 86.2%，由此可见老年群体被排除在微信技术覆盖之外。这种表征一方面体现在家庭生活环境中，当年轻个体沉浸在微信社交的“各种圈层”中时，家中的老年人无疑已经被排除在其社交场景之外，陷于孤独境况；另一方面在于微信支付功能的出现，意味着继个体的社交生活之后，其消费生活也被微信纳入技术范围之中。面对微信近 12 亿的用户量，微信支付已经覆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当越来越多的二维码和扫一扫出现在公交车、超市、菜市场和银行等公共社区时，微信之外的群体才真正成为了这场技术革命中的“数字难民”。

“数字仆人”的概念是在“数字原住民”之上提出。“数字原住民”是由美国教育作家马克·普伦斯基于 2001 年首次使用，指的是在信息时代长大、从小就熟悉数字技术和设备的人[8]。在此范畴中，当前 90 后和 00 后一批都可以被纳入“数字原住民”之中。而“数字仆人”重点强调人与技术的关系转变，美国新奥尔良洛约拉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沙伯格在其文章《今天的高校学生不是数字原住民，而是数字仆人》中指出当前个体与数字技术之间的关系已从数字技术服务于人转变为人服务于技术。在此基础上为审视微信之下的反向驯化特征提供了一种新视角。随着微信技术从个体的社交生活到消费购物再到学习工作等领域的深入，个体开始越来越多的通过微信完成生活和工作所必须，例如学生每天都可以通过微信接受大量来自学校的信息，上班族通过微信接收来自工作的信息。在此过程中，微信的强弱社交圈层边界已经变得愈加模糊，个体开始被迫接受大量来自公领域的海量信息对私人领

chinaXiv:202303.00722v1

域的“入侵”，开始从最初的分享者转变为技术捆绑之下的被动配合者，成为被动迎合技术的“数字仆人。”

四、微信技术的反向驯化归因

关于微信技术的反向驯化归因，技术决定论中强调技术意志支配的强大，对人的异化形成支配力量；社会决定论者认为个体在技术面前所产生的行为和心理上的异化是由于在使用技术时没有把握好尺度所导致。两种技术观点都存在对技术或者人类主体的绝对化倾向，在反向驯化的框架下，技术对人类的驯化是在个体与媒介技术的双向互动中产生，人与技术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其中既包括技术本身的内在逻辑，也包括个体在使用技术时的主动性发挥。

（一）技术意志和技术逻辑使然

微信的发展代表了媒介技术的发展，其背后的技术意志和内在逻辑要求技术的使用者主动的做出改变。微信从最初的免费图片传送应用到如今的支持语音视频等功能的移动社交软件，每一步都在技术逻辑的支撑下致使用户主动适应其技术改变。例如朋友圈、红包、群聊、扫一扫等功能的出现，都在用户的使用和适应中获得发展，与此同时，用户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也开始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改变，在技术改变和重塑世界中成为其意志的“能动实现者”[9]。

（二）“非目的性规训”下的精神依赖

作为一种工具化存在，媒介越来越成为人在生产、生活中须臾不可离的一个中介物，甚至有时候成为目的本身，即人们逐渐形成对媒介的某些非目的性精神依赖[10]。美国社会学家贝雷尔森在对报纸受众进行研究时曾指出读报本身也是人们阅读的目的。这一论断实质上揭示了人与媒介关系的两种属性，即“目的化”和“非目的性”，或者说人对媒介的精神依赖。当前，微信已经深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当我们在乘坐地铁打开微信或是睡醒打开微信，又或是睡前最后看一眼微信时，都成为了我们对微信的一种日常“非目的性”接触和使用，这种接触和使用成为了目的本身，并在“驯化”框架下成为了媒介技术对个体的“非目的性规训”，即微信打在我们身上的“烙印”，并逐渐融入我们的生活，形成习惯，而这种习惯本质上便是一种精神依赖，且带着难以意识的“非目的化”外衣。

（三）忽视“工具理性”背后的“价值理性”

数字技术时代是工具理性的时代，技术依靠强大的内在逻辑和意志日益占领个体的生活，个体在此过程中也日益呈现出技术的反向驯化特征。微信凭借数据技术对用户进行精细画像，并实现精准推送，变成用户的“爱看”“爱用”。而这种改变本质上是工具理性的胜利和价值理性的被忽视，工具理性成功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成为支配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力量。当前，微信带来的诸多影响已经深刻体现了“技术作为生产力的纯洁性已经消失，社会的一切行为都按照技术的逻辑进行理解和解释，最终变成了技术行为[11]。”然而这种被工具理性完全支配的力量也必然在个体生活的不同层面烙下技术的“痕迹”。例如“数字难民”和“数字仆人”的出现正是技术在忽视价值理性的迅猛发展之下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人的力量在于价值，而技术作为工具的力量是强大的，当技术力量开始完全支配人的发展时，人对技术的“驯化”就反其道而行之，成为技术对人“驯化”。

chinaXiv:202303.00722v1

chinaXiv:202303.00722v1

结语

微信的发展为我们的社会生活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问题。聚焦于微信技术本身，这些问题其本质上都在于微信代表的技术力量的发展已经忽视了个体的价值力量，其工具理性完全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因此，对于媒介使用者而言，不仅需要发挥能动性，也要提升自身的媒介素养和媒介使用能力，以防止媒介对人的主体性的“驯化”；而媒介技术的创造者和开发者应平衡好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关系，建立良性的技术与人的双向关系。让工具实现价值，让价值独立于工具。

参考文献

[1]潘忠党.探讨新传媒技术应用中的“中介化”和“驯化”［J］.苏州大学学报，2014.4
[2]刘千才 张淑华.从工具依赖到本能隐抑：智媒时代的“反向驯化”现象[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4
[3]肖静.新媒介环境中人的异化［J］.当代传播，2007.5
[4]黄慧 马克思交往理论视域下的网络交往异化现象研究——以微信交往为例.[D]2022.05
[5]彭兰. 连接与反连接:互联网法则的摇摆.[J]国际新闻界,2019,2:20-37.
[6]杨逐原 郝春梅 微信使用中的孤独感研究——基于多重中介比较模型的视角[J].新闻与传播评论.2022.9
[7]Marc Prensky：数字土著 数字移民，胡智标、王凯译，远程教育杂志 2009.2
[8]王悠然 谨防高校学生成为数字仆人.[J]中国社会科学报.国际资讯.20220121
[9]刘千才 张淑华.从工具依赖到本能隐抑：智媒时代的“反向驯化”现象[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4
[10]赛伦.麦克莱.传媒社会学[M].曾静平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第六页.2005
[11]吴卫华.算法推荐在公共传播中的理性问题［J］当代传播， 2017.3
[12]颜昌武 叶倩恩.现代化视角下的数字难民：一个批判性视角.[J]学术研究.2022.02
[13]樊鑫鑫 罗雁飞.人机传播：智能家居的反向驯化倾向——基于人际需要三维理论的视角.[D].2022